

中国共产党 党委常委会体制研究

戴辉礼◎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党委常委会体制研究

戴辉礼◎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党委会体制研究/戴辉礼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60 - 9282 - 1

I. ①中… II. ①戴…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党委制 - 研究

IV. ①D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0329 号

中国共产党党委会体制研究

(ZHONGGUOGONGCHANDANG DANGWEI CHANGWEIHUI TIZHI YANJIU)

戴辉礼 著

策划编辑: 鲁艳芳

责任编辑: 杭 超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5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0 - 9282 - 1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736

导 论	001
第一章 党委常委会制度的基本理论分析	026
第一节 权力配置与运行的基本理论分析	026
一、权力配置与运行的内涵及基本原则	026
二、权力组织体制的类型学及其特征	032
第二节 党委常委会制度的逻辑与特征	035
一、委员会制的内涵及民主特性	036
二、党委常委会制度：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载体	041
三、对中国共产党党委常委会体制的基本理解	054
第二章 党委常委会体制的历史演变	057
第一节 党委常委会制度的创立	057
一、委员会制的选择与确立	057
二、党委常委会的设立	061
第二节 党委常委会体制的复杂化演进	065
一、常委会集权	065
二、党内民主发展中的党委常委会体制	071
三、一元化集权下的党委常委会体制	074
第三节 执政后党委常委会体制的发展与扭曲	077
一、党委常委会体制：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发展	077
二、党委常委会体制的扭曲	083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党委常委会体制的恢复与发展	086
第三章 党委常委会体制与执政架构的宏观分析	092
第一节 以党领政模式的理论分析	093
一、以党领政模式的规范分析	093
二、以党领政模式的实然分析	099
第二节 党委常委会体制与执政架构的制度运作	104
一、党委常委会与归口管理制的运作	104
二、党委常委会与党管干部制的运作	112
三、党委常委会与党组制的运作	116
第四章 党委常委会体制内部权力结构的微观分析	121
第一节 党委常委会权力产生的制度结构分析	121
一、党代会制度设计与党委常委会权力的产生	122
二、制度设计与“三会”之间结构性权力状态	130
第二节 党委常委会内部权力结构关系分析	135
一、规范层面的常委会内部权力结构	135
二、常委会内部权力结构关系的实然分析	138
三、常委会内部最需妥善处理的根本权力关系	143
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导体制比较	153
第一节 苏联共产党领导体制：变迁与比较	153
一、苏共领导体制的结构变迁	154
二、苏共领导体制与中共党委常委会体制的比较	159
三、中苏两党领导体制差异性的根本原因	164
第二节 越南共产党领导体制：形成、特征及成因	166
一、越南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形成	166
二、越南共产党领导体制的特征及成因	170
第三节 朝鲜、古巴执政党领导体制的特征	174
一、朝鲜劳动党领导体制的特征	175
二、古巴共产党领导体制的特征	178

第六章 执政转型视野下党委常委会体制改革分析	182
第一节 党委常委会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意义	182
一、党委常委会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82
二、党委常委会体制改革之于执政转型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189
第二节 党委常委会体制改革的现状及评估	194
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改革与完善	195
二、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体制的改革	202
三、党委常委会体制改革现状的总体评估	210
第七章 党委常委会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219
第一节 国内学界关于党委常委会体制改革路径的三种思路	219
第二节 党委常委会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路径	223
第三节 完善党委常委会权力产生与运行机制	227
一、完善党委常委会的选举	227
二、完善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228
三、强化对常委会的监督和问责	229
参考文献	231
后 记	243

导 论

一、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基本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宏观的经济体制变迁带来的是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进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快速转变。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并仍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转型。中国能在短短的三十多年内平稳快速地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转型，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奇迹。近十多年来，很多国内外学者都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词汇来形容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①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很难用单一因素来加以解释。但从根本上说，成就的取得是结构性制度安排尤其是政治制度安排的结果。很显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中国政治制度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政治权威。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政治发展理论所揭示的，强大而有效的公共政治权威对于维持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在中国，这个政治权威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国家的缔造者，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无论是在革命建国还是

^① “北京共识”是美国《时代》周刊前国际版高级编辑、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首先提出来的用以表述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概念。“北京共识”提出以后，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广泛热议，因而又出现了响应“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热门词语。

在推进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起着绝对的核心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下可控性的放权式改革，即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放松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逐步下放权力，从而释放出强大的社会活力，进而推动各项改革的成功。权威主义主导现代化转型，在中国具有相当程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那么，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组织国家权力和维持社会运行，这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首先要关注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话题。

政党国家（Party state）的制度安排决定当代中国的实际政治运行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逻辑，也具有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要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问题，就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及其实际政治运作机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通过长期武装革命最终取得政权的政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转变革命党的权力运行模式，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稳步推进，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都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组织原则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领导体制与决策体制在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在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过程中，党自身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其核心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依然保留着。党的领导体制是中国实际政治运作的灵魂，可以说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党的领导是通过党代会制、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制以及归口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实现的。其中，党委制是中国共产党权力组织体系中的关键制度安排。在党委领导体制结构中，各级党委常委会事实上又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是中国现实政治运作的枢纽。如果不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委常委会体制，那么对中国很多问题的观察和分析很可能只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而已，根本谈不上找到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密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传统执政模式进行改革。实际上，当代中国的新变化也正催生着执政模式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执政转型的一种典型反映。党委常委会体制作为中国政治运行中的核心权力体制，密切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转型。从制度设计上看，党委常委会体制

的产生、存在以及运作的历史合理性与逻辑合理性到底在哪里？党委常委会体制的权力结构和现实运作机制有何特征？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评估近十多年来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体制改革？党委常委会体制改革存在什么样的路径选择？弄清上述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研究党委常委会体制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有助于深化对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的理论认识。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两大重要利器。领导体制是组织制度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党代会制、党委制、党组制、归口管理制等都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体现。在现实的政治运行中，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至关重要，是党领导国家、执掌政权的核心制度安排。因此，党委常委会体制不仅是党内组织体制，更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核心体制。由于党的各级党委常委会在中国政治制度架构中的特殊地位，涉及中央或地方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决策，具有一定的保密性，较难获得经验材料，故而学术界对其关注和研究相对不够。这样不仅导致对党委常委会体制及其运行缺乏深刻的理论认识，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整个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的理解可能仅仅停留在党章规定的表层，从而无法深入。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基于中国自身的理论和话语建构，否则很容易陷入西方政治学构筑的理论话语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共产党党委常委会体制进行系统研究，是在领导体制研究上构筑中国理论话语的尝试，对于深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的理论认识，无疑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尽管这具有相当程度的挑战性。其次，有助于深化对党内民主以及执政转型的理论认知。从政治学角度来说，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核心目标就是构建强有力的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需要更加适应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转型中，党内民主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十多年来，无论党内还是党外、中央高层还是知识阶层，在是否需要党内民主和执政转型的问题上基本没有异议。经过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共同努力，党内民主理论、执政转型理论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就党内民主来说，无论是在其内涵、功能、突破口，还是在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与领导体制的关系以

及党内民主与执政转型的关系等问题上，实际上都还存在着较大争议。就执政转型来看，存在的争议就更大。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转型的目标和方向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由此导致提出的各种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之间存在巨大区别。领导体制的转型是党内民主和执政转型的内在组成部分。在现代国家构建的宏观视角下，系统地研究党委常委会体制及其改革，是党内民主理论和执政转型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其理论价值在于通过全面研究党委常委会体制的理论基础、历史由来、权力配置、运行逻辑以及内在结构，揭示其与执政转型的内在关联，为制度完善和机制创新奠定基础。

政治学研究需要直面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对于中国政治研究来说更是如此。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党委常委会体制，对于了解中国政治模式以及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路径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现实政治运行的体制机制与内在逻辑。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政治上层建筑一经建立，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具有重大的制约作用，政治制度形塑着社会行为和个体行为。理解中国现实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在于深入研究中国政治运行模式。任何表面观察和静态的、单一的西方政治学术语都难以准确描述当代中国政治的复杂特征。只有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运作的动态过程和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究，才有可能理解其内在逻辑。了解中国政治运作过程和机制的关键又在于选择一个好的切入点。政治制度运行的实质是政治权力的运用，政治权力运用的载体就是领导体制，因此从党的领导体制入手剖析中国政治运作模式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党委常委会体制作为中共领导体制的核心，以其作为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突破口显然是最佳的路径。其次，可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探索提供参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也带来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在经济“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官员腐败、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凸显；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紧缺等问题日益严重，中国面临着迫切转变发展模式的重大课题，实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集体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新的执政理念，正是体现转变发展模式的客观要求。转变发展模式与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建设息息相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政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过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定下了基调。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力度尚需进一步加强。近十多年来，无论是中央高层还是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可以说，在要不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党内党外、社会各界的共识还是很一致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非常复杂的重大问题，需要谨慎稳妥地进行，任何没有考虑到现实条件的激进方案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来说，首先必须进行深入研究，进而选择一个相对妥善的、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方案。对于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代中国社会各界的分歧实际上还是很大的。可行性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最佳的路径和突破口。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司法民主等都是社会各界讨论比较多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特别是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被认为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行性路径，早已正式写进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①，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战略选择。然而，究竟如何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转型，并没有比较成熟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还处在不断探索之中。党委会体制作为党的核心制度安排，与党内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因而，深入研究党委会体制及其改革，对于寻找党内民主建设的突破口和探索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都能提供有益的借鉴。

^① 早在198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就已经正式提到：“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1页。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都延续了这一基本思路。

二、国内外关于党的领导体制的研究综述

从广义的学科定位来说,作为一项关于实体性制度的研究,本研究属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范畴。从狭义上讲,本研究又属于党的领导体制研究的范畴。就通行的学科分类而言,有关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研究大都归为中共党史学或党建学的学科范畴。国内学者大多从党史、党建的角度来研究中共领导体制。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实际上不存在“中共党史研究”这一说法,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只是“中国研究”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并没有更为细致的划分。进一步说,国外学界关于党的领导体制的研究一般都归为“中国政治研究”名下。下面从国外和国内两个层面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一) 国外关于党的领导体制的研究

国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历史较长。苏联和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展开研究,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也开始兴起。^①国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较浓厚的兴趣,迄今为止产生了一批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国外学界涉及中国共产党组织体制和领导体制方面的研究散见于各类学术作品中,相当零散,很少有真正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学术著作。就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相关研究来看,大致可以以1989年为界将其划分为两个时期。

1989年以前,以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约翰·布赖尔·斯塔尔(John Bryan Satrr)、詹姆斯·R. 汤森(James R. Townsend)、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哈里·哈定(Harry Hardirg)、约翰·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鲍大可(Doak Barnett)、弗兰兹·舒曼(Franz Schumann)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领导体制以及权力更替都

^① 参见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有过不同程度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一时期，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代表性文献（以英文文献为主）主要有：鲍大可的《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干部、官僚机构和政治权力》、约翰·刘易斯的《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体制》、萧佐良（Hsiao Tsao-Ling）的《中国共产主义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詹姆斯·R. 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合著的《中国政治》、詹姆斯·R. 汤森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查默斯·约翰逊主编的《共产主义体制中的变革》、赵国君（Chao Kuo-chun）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弗兰兹·舒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迪特米的《中国中央政治机构的正式结构》、哈里·哈定撰著的《将中国组织起来：官僚机构的问题（1949—1976）》、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合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5—1965）》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卫藤潘吉编著的《现代中国政治结构》、朗曼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传统与现代化》、约翰·布恩斯（John Burns）等人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任命制：对1979—1984年党控制干部选举的文献研究》、冷少川（Shao-Chuan Leng）等人编著的《中国的变化：党、国家与社会》。^①此外，许多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特别是党史人物研究专家在各自的研究中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有所涉及，在此不一一详细列出。

纵观上述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国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但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

① 除上述著作外，还有一些论文或多或少涉及党的领导体制方面的内容，代表性论文主要有：Lawrence R. Sullivan,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 No. 2, 1989, pp. 111-120; Lawrence R. Sullivan,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1950s", *Pacific Affairs*, Vol. 59, No. 4, 1986-1987, pp. 605-633; Heath B. Chamberlain, "Party-Management Relations in Chinese Industries: Some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Economic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2, 1987, pp. 631-661; Lawrence R. Sullivan, "The Role of the Control Organ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77-1983", *Asian Survey*, Vol. 24, No. 6, 1984, pp. 597-617; Keith Forster, "The Reform of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s in China: The Case of Zhejiang", *Asian Survey*, Vol. 24, No. 6, 1984, pp. 618-636; Trong R. Cha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sian Affairs*, Vol. 11, No. 1, 1980, pp. 43-54。

并不多。在这些研究文献中，对中国共产党及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术作品具有重视中国共产党上层政治、偏重模式化研究、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等特征。进一步说，国外学者比较喜欢运用权力政治学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精英和上层政治进行分析与解读，比较喜欢运用模式化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权力体制、意识形态以及中国政治的特征。很显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冷战”的国际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长期对峙，意识形态差异大，中外相互交流和了解相当有限，因此国外学者很难获得比较充分的研究资料，更缺乏近距离观察当代中国政治运作过程和运行机制的机会。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容易脱离中国语境。其结果就是，国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和实际政治运作的研究，尽管可能具有一定的深度，但研究结论可能偏离实际，甚至会违背常识，不能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在评价方面比较难以做到客观化。在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作品中，或多或少会出现史实不准、结论单一以及评价片面等问题。研究资料不足，必然偏向上层政治这个局部领域，必然借重理论分析和理论模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国家利益需要，很大程度上又会强化模式化研究。美国著名学者奥克森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曾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概括为七种模式。^① 模式化研究和意识形态预设结合在一起的典型反映就是极权主义模式的一度盛行。“极权主义的出发点就是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体系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社会，主要考察领导者的作用、党的作用、思想控制、警察组织以及高层的权力斗争。这种模式又称为‘中国就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与纳粹德国’的一种研究方法。”^② 一些西方学者把当代中国政治体制视为苏联体制的翻版，是一种极权主义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归类为共产主义极权政党，显然带有极大的意识形态偏见，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典型体现。这一时期，国外特别是美国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和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评价，很多都没有突破极权主义框架。很显然，模式化研究具有很大的缺

① 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

②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陷。正如林尚立教授所总结的，模式化研究容易导致对当代中国政治认识的简单化和机械化。^① 总的来看，在固定化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下，国外学者关于中共领导体制研究，虽然能够发现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某些特征，但并没有真正发现当代中国政治的内在运行逻辑，特别是没有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当然，国外对当代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变化不是特别明显。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大成功，加上中外学术交流不断增加，资料信息的开放，更多的国外学者（包括海外华裔学者）进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国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大有“显学”的趋向。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并不是热门主题。进入到 21 世纪以来，国外学界又重新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研究，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带回到中国政治研究中”^②，由此催生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的新热潮。这一时期，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布鲁斯·迪克逊（Bruce J. Dickson）的《中国和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适应性》、邹谠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黄靖（Huang Jing）的《中共政治中的宗派主义》、托尼·赛奇（Tony Saich）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献与分析》、国分良成的《中国政治与民主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证分析》、毛里和子的《现代中国政治》、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从集权统治到韧性威权：中国政治变

① 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 页。

② 2002 年，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举行了题为“把政党带回来：中国是如何治理的？”的国际研讨会，明确提出“把中国共产党带回到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呼吁。参见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前言第 2 页。

迁之路》、香川正俊的《中国共产党与政治、行政、社会改革》。^①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中国政治领域也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积极进行调整。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开始改变研究策略和转变研究路径,开始从局部研究和模式化研究转向对中国政治领域的全面性研究和具体化研究。正如林尚立教授总结的,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基本路径出现了从上层政治研究到整体政治研究、从模式化研究到现实化研究两大转向。^②随着研究背景的转换和研究资料的逐步丰富,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国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整体上学术性更强、评价更客观、意识形态色彩有所减弱。具体到中国共产党研究来说,在研究内容上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党内民主、执政机制、未来前景,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在研究取向上,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变化和执政转型,与以前相比分析更为全面、理性,评价更为客观。这些变化表明不少国外学者已开始认识到以前研究的局限,更多地关注中国共产党以及当代中国发生变化的一面。但尽管如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本质特征的看法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前景的认识,西方学者(包括华裔学者在内)与国内学者的分歧却很大。以麦克法夸尔、鲍瑞嘉(Richard Baum)、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章家敦、裴敏欣为代表的一些学

① 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方面内容的代表性论文有:Shaun Breslin, "Do Leaders Matter? Chinese Politics, Leadership Transition and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14, No. 2, 2008, pp. 215-231; Bruce J. Dickson, "The Future of China's Party-State", *Current History*, Vol. 106, No. 701, 2007, pp. 243-245; Zhiyue Bo, "The 16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Factional Group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3, No. 39, 2004, pp. 223-256; Shiping Zheng, "Leadership Change, Legitimacy, and Party Transi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 1-2, 2003, pp. 47-63; Thomas Kampen, "The CCP's Central Committee Departments (1921-1991): A Study of Their Evolution", *China Report*, Vol. 29, No. 3, 1993, pp. 299-317; Young Nam Cho, "Elite Politics and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in China: Changing Norms amid Continuing Questions",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20, No. 2, 2008, pp. 155-168; Gang Lin, "Leadership Transition, Intra-Party Democracy,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44, No. 2, 2004, pp. 255-275; Sujian Guo, "The Party-State Relationship in Post-Mao China", *China Report*, Vol. 37, No. 3, 2001, pp. 301-315; John P. Burns, "Strengthening Central CCP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The 1990 Nomenklatur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8, 1994, pp. 458-491。

② 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9页。

者持悲观主义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是脆弱的，会不断陷入困境甚至崩溃。^①有的学者甚至直接预测中国崩溃的时间，“中国不可能维持一种完全封闭的政治垄断并同时保持稳定。一些事会起到推动的作用。它或许不是10年之内的事，但我非常确定它将在25年内发生，或许只是10到15年”^②。这些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持悲观态度的基本理由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改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没有改变政党国家的执政体制，由此必然导致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和治理无效。显然，持悲观主义态度的学者并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变化。黎安友、布鲁斯·迪克逊、沈大伟、柏思德（Kjeld Erick Brodsgard）以及海外华裔学者郑永年、杨大利、李成、薄智跃等人持乐观主义态度。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正在成功应对并调整适应它所面对的各种挑战，中国政治体制不会失败和崩溃。^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活力的党，它有能力牢固地控制住中国当前的体制”^④。与悲观主义者相比，持乐观主义态度的国外学者更多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调适能力。事实证明，持悲观主义态度学者的看法是错误的，很多预言成了笑话，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展现出更多的体制优势。

总的来看，国外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立场、问题意识、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及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或进行了描述，或进行了分析与解释。国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分析对于本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国外仍有部分学者或秉持传统的理论模式，或怀有体制优越性傲慢，或出于国家利益目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存在路径依赖式的偏见，忽视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民主、执政转型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实质进步。虽然有很多国外学者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变化，但对中国

① 参见〔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48页。

② Larry Diamond, “Authoritarian Learning: lessons from the Color Revolutions”,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12, No. 2, 2006, p. 219.

③ 参见〔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58页。

④ 〔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